

伊斯兰复兴视角下的土耳其 伊斯兰极端主义探析*

• 邹志强

[内容提要] 中东地区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灾区，但土耳其作为中东地区大国，却走出了一条相对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发展道路。在伊斯兰复兴进程中，伊斯兰极端主义始终未能在土耳其产生重大影响。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以温和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形态为主流，主要包括社会伊斯兰运动与政治伊斯兰运动两种思潮及模式；另一方面，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则与政治、社会与经济转型相互交织，经历了蛰伏、活跃和异变等不同阶段，有着自身的发展特点。在温和伊斯兰主义的主流背景下，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包括国内世俗与宗教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16ZDA09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到上海市哲社规划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合作机制研究”(2016BCJ001)和第11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8T110328)的资助。

之间的张力、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国际形势与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变化等等。对于“如何把握世俗化与伊斯兰主义关系”“在社会经济转型中规范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为伊斯兰主义力量留出多大发展空间”等问题，土耳其的经验教训和治理实践值得借鉴。

【关键词】土耳其 伊斯兰复兴 伊斯兰主义 伊斯兰极端主义

在 20 世纪后半期，伊斯兰复兴是中东地区最突出的社会政治现象之一。“伊斯兰复兴运动是伊斯兰文明在伊斯兰教而不是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它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接受和对西方文化的摒弃，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导来信奉。”^① 然而，当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后，伊斯兰极端主义也日益蔓延。就本质而言，宗教极端主义对宗教信仰及其思想文化予以极端、片面和有害的曲解，是具有显著政治性和暴力性的意识形态。^② 作为观念形态的宗教极端主义，必定显现为极端的政治行为。^③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伊斯兰主义的一部分，虽然偏离主流，却凭借其显性存在和日益突出的影响力而备受关注。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宣扬“真主主权论”，企图以宗教神权代替国家主权。为实现政治目标，他们随意解释和颁行伊斯兰教法，推行伊斯兰化政策并大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10 - 111 页。

② 吴云贵：“当代宗教极端主义简论”，载《世界宗教研究》，2017 年第 2 期，第 1 页。

③ 金宜久：“宗教极端主义的基本特征”，载《中国宗教》，2004 年第 2 期，第 15 页。

肆鼓吹“圣战”。^①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快速发展及其对国家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冲击已经成为全球性挑战，如何开展有效治理也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

作为发源地，中东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最猖獗的地区，既产生了影响重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运动和代表人物，也诞生了“基地”“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组织。历史上，中东地区大国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发端较早。但是，得益于相对彻底的世俗化改革与长期坚守的世俗化道路，土耳其的伊斯兰运动一直以较温和的方式逐步复兴，极端色彩较少。虽然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中东地区格局变动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下，一些极端主义思潮和组织不时冒出，但影响力始终有限。在当代中东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泛滥的大背景下，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演变及其治理实践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一、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与温和 伊斯兰主义的主流地位

奥斯曼帝国起源于安纳托利亚地区，在一系列针对拜占庭帝国的“圣战”中迅猛崛起。与其他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民族一样，奥斯曼人对伊斯兰教相当虔诚，对“圣战”使命亦很执着。此后，不断扩张的帝国疆域和哈里发的头衔进一步强化了奥斯曼帝国领导人对伊斯兰教及伊斯兰世界所怀有的使命感。他们自视为伊斯兰世界和全体穆斯林的代言人和守护者。宗教的炽热情感和帝国的辉煌历史构成了伊斯兰主义思潮的重要心

^① 吴云贵：“试析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社会思想根源”，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3期，第7页。

理基础。进入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日薄西山，终至摇摇欲坠，内外危机四伏。奥斯曼帝国晚期的内外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伊斯兰化倾向，苏丹更加强调自身作为全球穆斯林领袖和哈里发的地位，从而维持合法性和号召力。“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简称“双泛”）思潮一度受到奥斯曼帝国领导人的青睐而被广泛利用，伊斯兰主义的激进思想开始兴起、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帝国还曾利用“圣战”思想号召伊斯兰世界打击敌对国家，甚至派出外交使团前往中亚等地进行宗教动员。同时，于帝国末期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一度极为重视推行泛突厥主义政策。^① 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的战败和解体使这一实践遭到失败，但也为以后的伊斯兰复兴乃至极端主义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凯末尔领导实行了彻底的世俗化改革。在政教分离的同时，他将宗教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废除了哈里发制度与伊斯兰教法，解散了伊斯兰法院和宗教基金部，取消了宗教学校和大学内的经学院，同时颁布世俗化的宪法、民法和刑法，运用强力手段将宗教势力排除出国家政治生活和公众活动。通过改革，土耳其政府基本消除了伊斯兰教和乌里玛（宗教学者）群体的原有地位和影响力。在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共和国确立的世俗化道路，即为国家控制宗教，甚至试图重塑一个土耳其式的伊斯兰教。尽管如此，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思潮依然在悄悄发展：建国后形成的“努尔库运动”引领了社会伊斯兰主义思潮，而穆斯林兄弟会也在20世纪30年代逐步掀起了政治伊斯兰运动。然而，在世俗化改革和威权体制的双重掣肘下，伊斯兰主义思潮和政治伊斯兰运动均处于

^① 管涛：“奥斯曼、伊斯兰还是土耳其？”，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1期，第130页。

缓慢发展状态，社会政治影响十分有限。例如，温和伊斯兰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努尔库运动”的开创者赛义德·努尔西（Said Nursi）就被判过刑，且受过长期监禁。

在 20 世纪后半期，伊斯兰复兴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潮流，同时也是当代土耳其的重要时代特征。^①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背景。战后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成为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直接推动力，伊斯兰价值观逐步得到民众、政党乃至军方的广泛认同。^② 经济结构的变化伴随着中心与边缘、沿海与内地、精英与草根之间的分化，促使基层民众认同并渴望伊斯兰教。民主化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现代化和经济结构变化使得中下层民众的影响力上升，于是，对伊斯兰教的虔信、对西化的不满和对民主的诉求均为伊斯兰主义复兴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出现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20 世纪 50 年代民主党执政后，官方放松了对宗教团体、宗教学校的控制，伊斯兰势力开始复苏，苏菲主义教团重新活跃起来。例如，蒂简尼亚（Tijaniya）教团曾多次破坏凯末尔的雕像，努尔库运动的发展也进入了鼎盛时期。随着宗教教育的新发展，一大批穆斯林知识分子应运而生。他们的崛起也进一步推动了伊斯兰教的政治化。^③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土耳其国内意识形态出现明显的极端化现象，左右翼政治之间的激烈争斗催生了一系列极端恐怖组织。在土耳其政治中，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

① 管涛：“延续与变迁：当代土耳其的政教关系”，载《西亚非洲》，2018 年第 2 期，第 35 页。

② 刘云：“从救国党到繁荣党：看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变迁”，载《西亚非洲》，1999 年第 4 期，第 23 页。

③ 冯璐璐：“近现代土耳其伊斯兰教法的世俗化改革”，载《新疆社会科学》，2004 年第 6 期，第 65 页。

义的分化开始变得泾渭分明，斗争日趋激烈。^① 70年代后期，土耳其发生了由各种左翼、极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团体发动的政治恐怖主义活动。1976—1980年间，有5000多人在数百起恐怖事件中丧生。^② 在此背景下，社会伊斯兰运动和政治伊斯兰运动都得到极大发展。居伦运动、民族秩序党、救国党、繁荣党（福利党）等宗教色彩浓厚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及政党纷纷涌现，开始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70年代勃然兴起的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对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伊斯兰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伊斯兰复兴运动重新确认、全面肯定伊斯兰教在现代国家社会建构中的指导作用，主张伊斯兰国家应当走独立自主的“伊斯兰发展道路”，鼓吹宗教思想政治化、宗教组织政党化、国家体制伊斯兰化。在政治伊斯兰主义的推动下，伊斯兰教成为一种以宗教传统为依托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该时期，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也得到复兴，其社会基础由安纳托利亚的乡村地区逐步向城市下层和中产阶级扩张。军方及世俗主义势力与伊斯兰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博弈更加激烈和凸显。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崛起得益于多党制的确立、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及冷战背景下的土耳其—伊斯兰综合体。^③ 但激进伊斯兰主义的主张在土耳其并没有太大市场，也遭到了主流伊斯兰主义派别的抵制和政府的严厉打击。

进入21世纪以来，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运动获得飞跃式发展。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

① 刘云：“当代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的发展”，载《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66页。

② Sabri Sayari,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errorism in Turkey, 1976–80: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22, no. 2 (2010), p. 198.

③ 刘义：“伊斯兰教、民族国家与世俗主义——土耳其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第38页。

ment Party, 简称正发党) 自 2002 年大选后长期垄断执政地位, 获得了空前广泛的社会支持, 成为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典型代表。在正发党的领导下, 土耳其经过多次修宪和与军方的斗争, 世俗主义势力被严重削弱。正发党不仅摆脱了随时可能被颠覆和镇压的命运, 而且取得了对军方和世俗势力的绝对优势。但是, 在打击世俗化的同时, 正发党依然坚持世俗国家的宪政框架, 务实推进国家治理和发展, 将伊斯兰教与世俗民主巧妙地结合起来, 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伊斯兰民主模式——“土耳其模式”, 由此成为中东国家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效仿榜样。以温和伊斯兰主义和西方民主制度有机结合为特色的“土耳其模式”一度成为土耳其人的国际“名片”, 受到西方国家热捧。土耳其被奉为“伊斯兰世界的民主样板”, 极大地提升了软实力及其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中的重要性。^①

人们唯有结合土耳其主流的伊斯兰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发展背景, 才能深入认识当代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演变及特点。有学者认为, 当代土耳其存在三种不同版本的政治伊斯兰: 一是凯末尔主义为适应土耳其现代化、世俗化国家构建而改造的伊斯兰教; 二是在保守宗教氛围中崛起的传统政治伊斯兰和现代政治伊斯兰; 三是以“土耳其真主党”为代表的伊斯兰极端主义。^② 总体来看, 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思潮和组织以温和形态为主流, 主要包括社会伊斯兰运动与政治伊斯兰运动两种思潮、组织及发展模式。虽然在伊斯兰复兴的大背景下, 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不断发展演变, 并产生了一些极端

^① 邹志强: “经济失速背景下的‘土耳其模式’危机与土欧关系”, 载《欧洲研究》, 2017年第2期, 第43页。

^② Rainer Hermann, “Political Islam in Secular Turkey,” *Islam and Christian - Muslim Relations*, vol. 14, no. 3 (2003), p. 268.

主义组织，但这些组织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影响力十分有限。

土耳其的社会伊斯兰运动以努尔库运动和居伦运动^①为代表。赛义德·努尔西长期从事伊斯兰文化教育启蒙和宣传运动，通过著书立说宣扬伊斯兰原则，其中包括影响颇大的《光明信札》（也称《光明集》）。他所倡导的宗教文化和教育启蒙运动影响力不断扩大，迅捷有效地吸引了大量追随者，被称为“努尔库运动”（又称“光明道路运动”）。1925年，库尔德人起义发生之后，土耳其政府以宣扬极端伊斯兰思想、开展非法宗教活动为由禁止“努尔库运动”活动，努尔西本人也长期遭流放和囚禁。土耳其实行多党制后，“努尔库运动”获得了新的发展，追随者数量在1960年达到200万人，成为土耳其最主流的伊斯兰宗教文化复兴运动。1960年，土耳其军人干政导致民主党下台，“努尔库运动”再次受到打压并陷入低潮。努尔西赞成自由民主，提倡科学理性，倡导宗教宽容，反对政党政治。^②他不介入政治，更不以组党建政为目标。努尔西也将《古兰经》作为思想指导，接受苏菲主义思想，倡导泛伊斯兰主义。他宣称，自己致力于提供能够解决所有日常生活和伦理道德问题的知识，还认为，国家是宗教的保护者，应以《古兰经》为国家宪法，由乌里玛群体治理国家。^③

1960年努尔西去世后，努尔库运动因内部意见分歧而分裂为多个派别，其中，费图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又译为法

① 也被翻译为“葛兰运动”。学界对居伦运动是否属于社会伊斯兰运动存在不同看法。该运动既没有成立政党组织，也没有公开参与土耳其政治活动，但由于事实上深度介入土耳其国内政治，并与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有过深度合作和激烈博弈，因而表现出很强的政治色彩。由此可见，居伦运动兼有社会伊斯兰运动与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双重特征。

② 敏敏：“从努尔西到努尔库运动”，载《西亚非洲》，2004年第2期，第42-44页。

③ Feroz Ahmad, "Politics and Islam in Modern Turkey,"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7, no. 1 (1991), p. 11.

图拉·葛兰)领导的新努尔库运动(后被广泛称为“葛兰运动”或“居伦运动”)影响最大。费图拉·居伦主张温和的伊斯兰教,反对任何形式的抵抗和现有秩序的暴力,也倡导建立强大的国家和土耳其伊斯兰。^①在他看来,土耳其的伊斯兰运动应进入除政党政治之外的所有社会空间,让伊斯兰融入 to 社会生活之中;更加重视科学知识,主张伊斯兰与科学、民主兼容,提倡宗教宽容和信仰对话。通过发起夏令营和“阳光之家”,居伦运动打造出了“黄金一代”,并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继而在全球广泛兴建数百所居伦学校。通过发展现代科学和文化教育、培养高端人才和支持者,继而涉入媒体和经济领域,居伦运动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扩大。该运动继承和发展了努尔库运动,并加以创新,由此成为一个思想温和、体系完整、组织有序、实力雄厚、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非政府组织。^②居伦运动具有土耳其民族主义的鲜明内涵,提出“土耳其伊斯兰教”的特殊性,重视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虽然居伦运动明确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却支持泛突厥主义。通过开办国际学校,宣传泛突厥族群观念,居伦希望建立一个伦理至上、科学竞争的突厥世界。^③因其社会活动特点,居伦运动被认为是社会伊斯兰主义运动,也被视为一种公民社会运动。居伦本人成为当代土耳其著名的伊斯兰思想家,曾被西方媒体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同时,居伦运动虽然不直接参与政党政治,但由于其不断

① Rainer Hermann, "Political Islam in Secular Turkey," *Islam and Christian - Muslim Relations*, vol. 14, no. 3 (2003), p. 270.

② 杨恕、张玉艳:“努尔库运动与葛兰运动关系辨析”,载《新疆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80页。

③ Berrin Koyuncu - Lorasdagi, "The Prospects and Pitfall of the Religious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Turkey: The Case of the Gülen Movemen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6, no. 2 (2010), p. 226.

介入政治活动，并一度与正义与发展党关系密切，因而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政治影响力，甚至被称为土耳其政府的“平行机构。”不过，这也成为二者后来走向决裂的根本原因。2016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之后，居伦运动被指为幕后推手，遭到土耳其政府的强势打压。

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快速崛起，主要表现为一批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成立和壮大。以纳杰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为代表的“民族观念”运动（Milli Görüş Hareketi）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的伊斯兰政党。^①1970年和1972年，民族秩序党（National Order Party）、救国党（National Salvation Party）^②先后成立。在1973年全国大选中，救国党获得11.8%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三大党并参与组阁，同时成为当代土耳其政治伊斯兰崛起的开端。作为民族观念运动的缔造者和伊斯兰主义政党领导人，埃尔巴坎在70年代就曾三次担任土耳其政府副总理。救国党强调公正、民主和多元，要求复兴伊斯兰教，具有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色彩。虽然遭到世俗势力的不断打压并遭解散，但政治伊斯兰运动依然不断发展壮大。1983年，脱胎于救国党的繁荣党（Welfare Party）成立，逐步获得大量支持。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担任总理期间，试图将民族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等意识形态有机融合在一起，但受到多种复杂原因的影响，其领导的祖国党（Motherland Party）逐渐走向衰落，而繁荣党

① 刘义：“土耳其的政治危机：政治伊斯兰与民粹主义”，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6期，第114页。

② 也被翻译为“民族拯救党”或“民族救赎党”。

则在90年代初期逐渐成为土耳其伊斯兰力量的中心,^①并在1995年大选中一跃成为第一大党。1996年,繁荣党成功组阁,埃尔巴坎成为总理。伊斯兰主义政党首次成功执政,成为20世纪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潮。然而,埃尔巴坎在1997年被军方发动的软政变推翻,繁荣党被取缔。1998年,与之一脉相承的美德党(Virtue Party)成立,也被军方于2001年取缔。

此后,埃尔巴坎的追随者埃尔多安等人组建了正义与发展党,并在2002年大选中成功获胜,成为第一个在国会中占据多数议席的、带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执政党。正发党连续获得大选胜利,并在国内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支持下,赢得了同土耳其军方、世俗派力量的斗争胜利。该党不仅牢牢地掌握着政权,在国家治理方面还带领土耳其取得了不俗成绩。正发党虽然因其伊斯兰色彩和一些“回归伊斯兰”的改革措施而广受质疑,但并未改变土耳其的世俗化属性。它吸取了以往伊斯兰政党被取缔的教训,与伊斯兰激进派别划清界限,谨慎地对待自身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属性和诉求,既利用宗教动员来支持民主选举,也坚持世俗主义原则。在正发党与埃尔多安治理下的土耳其,伊斯兰色彩固然有所加强,但依然维持着世俗国家的底色。对于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与其说是正发党坚持宗教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它对土耳其社会的宗教回归和宗教复兴诉求的必然回应。^②

大多数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是温和的现代主义者。他们接受现代化,以伊斯兰的眼光审视土耳其的现代化,试图在土耳

① 参见郭长刚:“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与伊斯兰政党的发展”,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5期,第13页。

② 邹志强:“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危机与转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1期,第13页。

其建立现代的伊斯兰生活方式，而不是回到古老的以沙里亚法为基础的政治和社会制度。^① 无论是以“居伦运动”为代表的社会伊斯兰主义运动，还是以救国党、繁荣党和正发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主义政党，都表现出温和化、现代化特征。这些运动和政党虽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但并不主张在土耳其恢复伊斯兰教法统治，也没有秉持和采取极端或激进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行动，而是主张开放包容、现代化和民主自由，更为务实地解决现实的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以教育、科技或经济上的政策和行动来吸引国内民众的支持。当代土耳其的多数伊斯兰主义者确实接受了自由民主，虽然他们采取的是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方式。^② 例如，繁荣党提倡，在政教分离的前提下将现代化与伊斯兰传统相结合，既不搞全盘西化，也不搞政教合一，同时又不抛弃伊斯兰文化传统，而是力图解决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矛盾。^③ 正发党希望自己被视为一个克服传统政治伊斯兰狭隘观念的现代保守政党，甚至拒绝使用伊斯兰主义的标签。埃尔多安作为伊斯兰主义者开始其政治生涯，以现代主义态度成为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友好面孔，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也变得更为成熟。^④

① 刘云：“当代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的发展”，第68页。

② Michelangelo Guida, “The New Islamists’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in Turkey: The Examples of Ali Bulaç and Hayreddin Karaman,” *Turkish Studies*, vol. 11, no. 3 (2010), p. 347.

③ 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土耳其的社会历史发展”，载《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87页。

④ Rainer Hermann, “Political Islam in Secular Turkey,” *Islam and Christian - Muslim Relations*, vol. 14, no. 3 (2003), pp. 274 - 275.

二、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演变及极端组织

20世纪前期,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发展受到世俗化改革的全面压制,而伊斯兰极端主义主要是20世纪后期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意识形态的分化而产生的,主要表现为极端伊斯兰势力对伊斯兰教的工具化、泛化和极端化解读及其实践。

(一) 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演变

在土耳其共和国前期,世俗化改革对伊斯兰主义形成了全面压制。虽有部分伊斯兰主义运动得以形成,但影响力和极端化程度均十分有限。凯末尔时代的世俗化改革遭到了苏菲教团等宗教传统势力的抵抗和反对,苏菲教团甚至参与了1925年的赛义德起义。^①之后还有个别苏菲教团进行激烈抗争,要求恢复沙里亚法,制造极端事件,如1930年的“麦纳麦事件”。^②事发后,土耳其政府随之正式取缔苏菲教团。虽然伊斯兰教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遭到前所未有的削弱,但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民众的认同基础,仍在秘密状态下发展。^③这也成为后来土耳其伊斯兰复兴和伊斯兰主义强势反弹的重要背景。

^① 1925年2月,土耳其库尔德人教长赛义德领导发动起义,反对土耳其政权不承认库尔德人为少数民族、取缔库尔德民族语言等政策,曾一度控制了大片地区,但很快被土耳其政府镇压。

^② 1930年,纳格什班迪教团成员麦哈迈德率人在伊兹密尔的麦纳麦广场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恢复沙里亚法和哈里发,并残忍杀害了3人,史称“麦纳麦事件”。

^③ 李意:“土耳其世俗化进程中的伊斯兰因素”,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2期,第57页。

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实行民主化改革后,伴随着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分化与对立,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渐趋活跃。部分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开始从事暴力恐怖活动,但在土耳其并没有太大市场,且遭到政府强力镇压。1953年成立于约旦的“伊斯兰解放党”(Hizb ut - Tahrir,也称“伊扎布特”)自1962年起开始在土耳其活动。尽管该党建立了土耳其支部,其领导人却因“试图建立伊斯兰国家”而被捕入狱。70年代勃兴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对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伊斯兰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伊斯兰主义鼓吹宗教思想政治化、宗教组织政党化、国家体制伊斯兰化,反对西方化、世俗化,对世俗主义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造成严重冲击。^①伊斯兰复兴运动催生出激进的政治伊斯兰主义,成为推动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乃至泛滥的重要根源。从70年代起,宗教极端主义组织更趋活跃。它们试图建立伊斯兰政权以取代世俗民主政权。例如,1978年12月,111名阿拉维派教徒在卡赫拉曼马拉什被杀害。受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示范效应和伊朗“输出革命”的影响,土耳其的极端伊斯兰组织跃跃欲试,企图推翻现政权,以伊朗为样板建立伊斯兰国家。为了达成目标,这批极端分子实施了一些暴力恐怖活动。当时,伊朗媒体“德黑兰之声”经常抨击凯末尔及其世俗主义国家理念,霍梅尼本人和一些外交官也经常发表讲话,称土耳其政府是非法的。土耳其政府据此认为,国内的原教旨主义派别得到了伊朗的支持。面对国内原教旨主义的升温势头和伊朗的口诛笔伐,土耳其政府一方面对国内的激进组织与派别进行坚决打击,将一些激进分子逮捕,另一方面则对伊朗的伊斯兰宣传攻势不加理睬。

^① 吴云贵:“试析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社会思想根源”,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3期,第3-4页。

土耳其在 80 年代开启自由化改革后，伊斯兰极端主义更趋活跃，并多次针对世俗知识分子、温和伊斯兰学者、教堂、记者、美军士兵甚至他国外交官发动恐怖袭击。例如，“伊斯兰解放党”在土耳其宣扬建立哈里发领导下的伊斯兰国家，印制和传播一本名为《基于〈古兰经〉和逊奈——伊斯兰宪法》的出版物，鼓吹所有伊斯兰国家在一位哈里发领导下成为同一国家。1982 年，土耳其警方逮捕了 22 名“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其中 17 人为约旦和巴勒斯坦籍，5 人为土耳其人。经此打击，该组织在土耳其走向衰落。1981 年，一名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持枪袭击了正在土耳其访问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84 年出现了一个名为“真主党穆斯林”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该组织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并宣称，不仅要保护国家和宗教，更要保护“安拉之路”。1985 年成立的“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阵线”也是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典型代表，发动了一系列针对酒吧、舞厅、教堂、银行和犹太教团领导人的暴力袭击事件，在 1992 年还利用汽车炸弹先后将两名记者炸死，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该组织领导人萨里·米亚比扎卢撰写了 40 本宣扬极端思想的书籍，于 1998 年被土耳其政府以“企图利用暴力颠覆国家秩序”罪逮捕，但此后依旧活跃。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在土耳其活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仍然试图以伊朗为样板，建立一个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① 1991 年，“伊斯兰圣战组织”因反对马德里中东和谈而刺杀了一名美军士兵，刺伤埃及外交官，并策划了针对约旦、伊拉克和约旦外交官的暗杀事件。1993 年，负责调查土耳其人权事务的穆木库在伊斯坦布尔死于汽车爆炸事件。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泛滥

^① Ely Karmom, "Islamic terrorist activities in turkey in the 1990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vol. 10, no. 4 (1998), p. 101.

的背景下，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从潜藏状态迈入活跃期。本土自生和国际输入的极端恐怖组织威胁与日俱增。“9·11”事件及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极大地改变了全球战略态势，也推动了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盛行。作为中东与欧洲的门户，土耳其对国际恐怖组织具有很大吸引力，遭遇到日益突出的外来恐怖主义威胁。^①来自俄罗斯、阿富汗、黎巴嫩、利比亚等国的极端分子劫机、绑架人质、被捕的消息不断见诸报端，部分事件与“基地”组织存在关联。而伊拉克战争爆发的2003年是土耳其国内恐怖袭击事件频发的一年。当年11月，位于伊斯坦布尔的英国总领馆和汇丰银行、美国联合包裹公司大楼、犹太会堂等建筑遭遇4起汽车炸弹恐怖袭击，共造成57人死亡，约700人受伤。“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阵线”和“基地”组织都宣称对上述恐怖袭击事件负责，而“真主党”也可能参与其中，被捕的部分嫌疑人曾在阿富汗受训。土耳其也发现不少本国激进分子在巴基斯坦、埃及等国的“圣战学校”学习，并跟随国际圣战组织在多国作战。^②2006年，一名天主教徒在土耳其特拉布宗被枪杀；2007年，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受到伊斯兰极端分子威胁，被迫流亡美国。在土耳其警方的强力打压下，此后数年内，极端组织的活动相对平息，恐怖袭击事件一度大幅减少。

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土耳其在叙利亚等中东热点问题上屡屡出现政策失误，遭遇恐怖袭击的威胁相应剧增。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凸显出土耳其国内严峻的安全挑战，伊

^① Lawrence E. Cline, "From Ocalan to Al Qaida: The Continuing Terrorist Threat in Turkey,"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27, no. 4 (2014), pp. 321-322.

^② Emrullah Uslu, "Jihadist Highway to Jihadist Haven: Turkey's Jihadist Policies and Western Security,"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9, no. 9 (2016), p. 783.

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再趋活跃。土耳其一直为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提供支持，成为其后方基地与物资来源，客观上纵容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周边及国内的肆虐。美国发布的《国别反恐报告》就明确指出，对于希望加入“伊斯兰国”的外国志愿者和叙利亚、伊拉克等地恐怖组织的外国成员而言，土耳其已成为他们的来源国和过境国。^① 在一段时期内，土耳其甚至成为国际“圣战”分子流动的“高速公路”，伊斯坦布尔则是全球伊斯兰主义网络的中心。^② 土耳其也因此遭到国际伊斯兰极端主义和“伊斯兰国”（ISIS）等恐怖组织的不断渗透和严重威胁。

2015年是土耳其国内极端恐怖袭击及其反恐政策发生转折性变化的一年。不断升级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数百人死伤，其中大多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根据美国发布的《国别反恐报告》，当年土耳其共驱逐了来自85个国家的2337名外国恐怖分子嫌疑人。^③ 2016年，“伊斯兰国”在土耳其发动了更多大规模恐怖袭击，造成上千人死伤。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甚至被极端分子公开枪杀。当年，土耳其拘留了3089名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人，其中包括1381名外国人，最终逮捕了其中的1204人，包括618名外国人。^④ 2017年以来，土耳其发生恐怖袭击事件的风险依然居高不下。据统计，在2017年，仅伊斯坦布尔一地就逮捕了1447名与“伊斯兰国”组织有

①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4," April 2015, <https://www.state.gov/j/ct/rls/crt/2014/239406.htm> (登录时间: 2019年3月3日, 下同)。

② Emrullah Uslu, "Jihadist Highway to Jihadist Haven: Turkey's Jihadi Policies and Western Security,"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vol. 39, no. 9 (2016), pp. 781-796.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5," June 2016, <https://www.state.gov/j/ct/rls/crt/2015/257516.htm>.

④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6," July 19, 2017, <https://www.state.gov/j/ct/rls/crt/2016/272231.htm>.

关的嫌疑人，最终阻止了多起恐袭事件。^① 土耳其对叙利亚政策的转变，尤其是直接出兵叙利亚北部，促使多股势力针对土耳其连续发动恐怖袭击。“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组织和库尔德分离组织是这些袭击的主要策划者。国内安全局势的恶化以及外交政策的转变促使土耳其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反恐行动。土耳其逐步加大边境管控，并开展大规模反恐行动。2014年9月，土耳其参加了由美国召集的中东国家反恐联盟组建会议。之后不久，土耳其宣布对“伊斯兰国”实施军事打击。随着近年来“伊斯兰国”趋于衰微，国际伊斯兰极端主义对土耳其的威胁总体上有所减弱。

（二）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

在土耳其，温和伊斯兰主义虽为主流，但也存在着“异数”，即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和组织。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派别和组织多是原生型极端主义组织。进入21世纪后，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日益受到国际环境和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扩散的影响，外来输入型极端主义的影响日益凸显。

20世纪60年代以后，土耳其境内陆续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伊斯兰极端主义色彩的组织，主要包括：“伊斯兰圣战者组织”（Islamic Jihad）、“土耳其真主党”（Turkish Hizballah）、“土耳其伊斯兰解放军”（Turkish Islamic Liberation Army）、“土耳其伊斯兰解放阵线”（Turkish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伊斯兰革命军”（Fighters of Islamic Revolution）、“土耳其伊斯兰解放同盟”

^① “Nearly 1, 500 ISIL suspects detained in Istanbul in 2017,” *Hürriyet Daily News*, January 8, 2018,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nearly-1-500-isil-suspects-detained-in-istanbul-in-2017-125124>.

(Turkish Islamic Liberation Union)、 “世界沙里亚解放军” (World Sharia Liberation Army)、 “伊斯兰解放党阵线” (Islamic Liberation Party Front)、 “土耳其全球伊斯兰解放军” (Turkish Fighters of Universal Islamic War of Liberation)、 “土耳其伊斯兰军” (Turkish Islamic Fighters Army)、 “土耳其沙里亚复仇突击队” (Turkish Sharia Revenge Commandos)、 “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阵线” (Great Eastern Islamic Raiders' Front, IBDA - C)、 “安纳托利亚联合伊斯兰国家” (Anatolia Federative Islamic State/AFIS, Union of Islamic Communities or Hilafet Devleti)、 “伊斯兰解放党” (the Islamic Liberation Party) 土耳其分支、“哈里发国” (Hilafet Devleti)、 “基地” 组织土耳其分支 (El Kaide Terör Örgütü Türkiye Yapılanması)^① 以及“伊斯兰国” 组织等。

受反民族分裂主义和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土耳其政府对恐怖组织的定义比较宽泛。土耳其认定的极端恐怖组织主要包括“土耳其真主党”“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阵线”“安纳托利亚联合伊斯兰国家”“革命人民解放军/阵线”(DHKP/C)、“伊斯兰国”组织、库尔德工人党(PKK)、居伦组织(FETO)等。对于上述组织，土耳其政府并没有明确区分。事实上，这些组织包括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左派极端组织、库尔德分裂组织等多种类型。

“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阵线”是土耳其具有伊斯兰极端主义色彩的主要组织之一，被土耳其、美国、欧盟等列入恐怖组织名单。该组织尊奉土耳其已故著名作家、诗人和伊斯兰理论家内斯普·法兹尔·奇萨克雷克(Necip Fazil Kısakurek)为精神导师，其前身即为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

^① 参见李艳枝：“土耳其伊斯兰极端组织概述”，载《国际研究参考》，2009年第7期，第13页。

阵线”宣称，要在三大洲建立伊斯兰国家，在中东重建哈里发制度，以推翻土耳其世俗政权为目标，希望自土耳其开始、在全世界推行伊斯兰教法，取代现有的世俗国家制度和宪法。“9·11”事件后，该组织在土耳其策划了多起针对犹太教堂、酒吧、迪斯科舞厅和基督教教堂的袭击活动，并与“基地”组织建立联系，接受其指导。前文提及，2003年11月针对犹太会堂、英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的严重恐怖袭击事件就是该组织所为。这场袭击造成50多人死亡，400多人受伤，英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也被炸身亡。该组织在土耳其境内一直较为活跃，且倾向于支持“伊斯兰国”。

“土耳其真主党”成立于1980年，是土耳其国内土生土长的极端组织，与中东其他国家的真主党并无实质性关联。该组织早期主要在土耳其东南部地区活动，与库尔德工人党关系密切，后来二者决裂。“土耳其真主党”一度凭借与政府的合作，反对库尔德人、大肆发展自身势力，最终演变为一个“圣战”恐怖组织。该组织利用清真寺传播极端思想、发展成员甚或储存武器，出版宗教书籍，并逐步向大学生、教师和公务员等中上阶层扩展影响力。“真主党”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实施了大量犯罪和暴力活动。20世纪90年代后期，土耳其警方和军方开始严厉打击“真主党”，曾逮捕了1700多名“真主党”成员及其同情者，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真主党”的组织体系和犯罪活动也开始被外界所知，并在2000年1月击毙了“真主党”领导人侯赛因·韦利奥卢（Huseyin Velioğlu），导致“真主党”逐步衰落。

“安纳托利亚联合伊斯兰国家”也被称为“伊斯兰社团联盟”“卡普兰社团”，是一个总部位于德国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其创始人恰玛莱廷·卡普兰（Cemalettin Kaplan）深受伊朗伊斯

兰革命的影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前往德国，企图效仿霍梅尼在国外传教，最终达到在土耳其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目的。1985 年，他创建了“伊斯兰协会与组织联盟”，宣传伊斯兰革命思想，竭力反对世俗化的、政教分离的土耳其共和国，要求穆斯林和其他伊斯兰组织加入他的队伍。在创立多个组织之后，他于 1992 年宣布建立“安纳托利亚伊斯兰联合国家”，自称哈里发，发布了一系列包含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宗教法令”，但影响不大。1995 年，卡普兰去世，该组织因领导人继任问题陷入分裂，并与“基地”组织建立了一定联系，后在德国和土耳其的打击下陷入衰落。1999 年，该组织领导人麦廷·卡普兰在德国被捕，其组织也被德国政府取缔。2004 年，他被引渡回土耳其，并被判终身监禁。

国外输入型的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典型代表是“伊斯兰国”。自 2014 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迅速崛起以来，“伊斯兰国”被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界定为极端恐怖组织。虽然外界大都指责土耳其支持和纵容“伊斯兰国”，但事实上，“伊斯兰国”的渗透和扩张尤其是一系列恐怖袭击也使土耳其深受其害。经过一段时期的政策模糊，土耳其于 2014 年正式宣布“伊斯兰国”为恐怖组织，并加入了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此后，“伊斯兰国”在土耳其境内发动的恐怖袭击事件也急剧增加，成为主要的外来输入型极端恐怖组织。除上述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之外，土耳其境内也存在其他一些被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的极端组织。它们多为左派运动组织或库尔德人分离组织，以及少数伊斯兰极端组织。

三、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特点

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是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的伊斯兰教政治化的产物，是部分伊斯兰势力对教义的极端化解释和利用而形成的少数派力量。^①从历史和现实角度来看，土耳其的民族国家构建存在缺陷，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足。此外，土耳其长期存在民族教派矛盾和教俗对立。上述缺陷在外部环境尤其是周边地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下，共同构成了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土壤。但另一方面，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受到诸多内在因素的制约，影响力终究有限。

第一，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受到国内教俗对立格局的制约。在土耳其，深厚的伊斯兰传统与强力的世俗化改革之间长期存在着强大张力，两者在冲突中不断发展。尽管世俗化道路改变了土耳其的诸多方面，但伊斯兰教还是显示出非凡的韧性。伊斯兰复兴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土耳其的政治进程。^②世俗化的长期压制既刺激了伊斯兰主义的不断反弹与持续复兴，也在不断的斗争中限制和规范了伊斯兰主义的发展方向。可以说，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能量有限也是这一教俗关系格局的产物。伊斯兰复兴挑战了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式的现代性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土耳其国内世俗主义者与伊斯

① 参见李艳枝：“土耳其伊斯兰极端组织概述”，载《国际研究参考》，2009年第7期，第19页。

② Soon - Yong Pak, "Cultural Politics and Vocational Religious Education: The Case of Turkey,"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 40, no. 3 (2004), p. 321.

兰主义者权力斗争的结果。^①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具有典型的现代政治斗争的特点，而军人政变遏制了伊斯兰复兴势力的发展。^② 自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力量兴起以来，时刻受到国内世俗主义力量的强大制约，特别是作为世俗主义捍卫者的土耳其军方曾多次发动政变，对伊斯兰主义力量进行打压，导致二者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持续不断，塑造了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温和面貌。进入21世纪后，土耳其温和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崛起与执政使得教俗对立有所缓和，但并未解决根本矛盾，社会和民意的分裂依然十分严重。时至今日，这一矛盾仍是影响土耳其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态势的重要变量。

第二，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受到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冲击，但现代主义的主流价值取向制约了极端主义的生存空间和影响力。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不断高涨。这是伊斯兰世界普遍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现象，同时也对土耳其产生了直接影响，成为当代土耳其政治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也一度将“革命输出”的矛头指向邻国土耳其，导致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和组织趋于活跃。在80年代，土耳其出现多个宣称支持伊斯兰革命的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复兴运动可以分为传统主义和现代主义两种基本类型，相对于传统主义注重宗教、排斥外来文化的价值取向，现代主义更为务实和开放，强调宗教应与外部环境变化相适应，对外来文化积极加以融合利用。^③ 以此观之，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复兴运动更多地表现出现代主义的价值取向。无论

① 严天钦：“土耳其伊斯兰复兴与现代认同”，载《宗教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271页。

② 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土耳其的社会历史发展”，第86页。

③ 吴云贵著：《近代伊斯兰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是以努尔库运动、居伦运动为代表的社会伊斯兰主义运动，还是救国党、繁荣党、正义与发展党等伊斯兰主义政党，都持明显的开放、包容、温和态度，积极吸收利用现代西方科学知识、政治制度和制度。它们更多地从现代西方科学知识和制度中寻求发展动力，而不是盲目复古和回归传统，也不谋求推翻现行民族国家体制，因而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民族观念运动”既代表了保守伊斯兰边缘力量的崛起，也代表了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合法化和温和化。^①在很大程度上，主流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现代主义价值取向制约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及组织的发展，使后者在土耳其难以扩大市场和影响力。

第三，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内生性特点。就本质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土耳其伊斯兰主义思潮主要是由全球化推动的国内社会经济结构变化所致。^②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而激进的世俗主义和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也刺激了伊斯兰主义以及极端主义的发展。如前所述，土耳其主要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如“真主党”“安纳托利亚联合伊斯兰国家”“大东方伊斯兰袭击者阵线”等均为土耳其内部自生。虽然“安纳托利亚联合伊斯兰国家”由土耳其人创建于德国，但其影响力主要还是着眼于土耳其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只有“伊斯兰解放党”等极少数伊斯兰极端组织来源于国外。^③进入21世纪后，“基地”组织也尝试在土耳其设立分支组织，但总体影响力较为有限。虽然“伊斯兰国”在土耳其制造了不少恐怖袭击事件，其外籍“圣战”分

① 郭长刚：“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与伊斯兰政党的发展”，第19页。

② 刘云：“全球化背景与当代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社会基础”，载《西亚非洲》，2006年第2期，第36页，

③ 参见李艳枝：“土耳其伊斯兰极端组织概述”，第13页。

子也频繁借道此地，但其意识形态和组织发展在土耳其并未获得牢固根基。

第四，土耳其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受到土耳其内外政策与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近年来，国际输入型极端主义的影响不断上升。战后，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为土耳其伊斯兰教的复兴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① 由于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往往表现出对世俗化、西方化的反感和敌视，世俗国家执行的相关内外政策经常成为其攻击对象。一方面，土耳其长期、彻底的世俗化和亲西方政策是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的重要刺激因素。另一方面，土耳其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自 21 世纪以来，特别是“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土耳其内外政策和地区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国际输入型极端组织的影响变得更加突出，对土耳其的国内安全形势构成了严峻挑战。

四、结语

在当代土耳其，伊斯兰极端主义从来不是主流，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更是日益失去市场。伊斯兰极端组织始终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影响力和气候，组织多而分散。土耳其的世俗化、现代化转型较为成功，使得主流民众并不接受极端思想和组织，加之政府的控制力较强，对宗教极端势力长期持续进行打压，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组织的影响力始终不大。这反映出了当代

^① 黄维民：“伊斯兰教与土耳其社会”，载《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第25页。

土耳其国家发展道路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特殊性，其经验和教训也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

一方面，土耳其较为成功的世俗化改革对伊斯兰主义的发展路径起到了规范性作用，同时遏制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蔓延。另一方面，世俗化改革推动了土耳其伊斯兰教的现代化和温和化发展。“土耳其在伊斯兰教与现代性及民主的融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① 占据主导地位的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理念与力量对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例如，世俗主义的代表军方就多次发动军事政变，有效遏制了伊斯兰主义乃至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正是由于长期受到世俗主义的抑制，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力量在与世俗力量的博弈中逐步找到了生存之道，其主流始终没有走向极端化，反而开辟出一条温和的发展道路。这就使得伊斯兰极端主义无法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和社会影响。民主制度与世俗主义在土耳其紧密联系，巩固民主既有利于坚持世俗主义，也有利于确保政治伊斯兰长期保持温和化。^② 有学者甚至认为，以正发党为代表的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转变产生了另一种自由主义版本的世俗主义。^③

另一方面，土耳其逐步将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吸收进现行国家政治架构中，扩大其政治参与，甚至允许它们组阁执政。这也有助于防止伊斯兰主义的极端化与激进化。自 20 世纪后期实行多党制以来，土耳其的民主化和世俗化陷入两难处境。民主化越发展，国内的伊斯兰倾向就越明显，结果导致军队多次

① Metin Heper, "The Victory of the 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 in Turkey," *Mediterranean Politics*, vol. 8, no. 1 (2003), p. 133.

② Murat Somer, "Moderate Islam and secularist opposition in Turkey: implications for the world, Muslims and secular democrac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8, no. 7 (2007), p. 1271.

③ Ioannis N. Grigoriadis, "Isla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urkey: Secularism and Trust in a Divided Society," *Democratization*, vol. 16, no. 6 (2009), p. 1194.

干政。但是，军方干政和世俗主义压制并不能消除具有深厚社会根基的伊斯兰主义。反倒是土耳其多元主义和民主化进程颇具疏导功效，日益成为吸纳伊斯兰主义力量参与政治、限制伊斯兰主义极端化的理想工具。面对强劲的伊斯兰复兴势头，世俗党派和军方有意利用、引导伊斯兰主义的发展，使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带有部分官方色彩。最终，土耳其政府成功将伊斯兰主义纳入世俗民主的政治框架之内，避免了社会矛盾的激化。在世俗主义势力的压力下，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政党被迫在许多方面对世俗主义妥协。但如果将伊斯兰主义政党彻底排除在土耳其的政治中心之外，无疑会导致伊斯兰政治向更加激进的方向发展。^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政党经历了与世俗力量的持续博弈及多次失败，最终转变话语策略，从抗拒与对立转向融合与对话，运用西方现代政治理念构建伊斯兰认同。实践证明，传统的“伊斯兰主义”旗号已经逐渐失去昔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吸引力，而持保守民主立场的正义与发展党则通过温和化道路赢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②

① 刘云：“从救国党到繁荣党：看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变迁”，载《西亚非洲》，1999年第4期，第26页。

② 杨晨：“伊斯兰认同的历史演进——土耳其‘民族观念运动’反思”，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1期，第54-60页。

- 吴正选** 上海建桥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上海高校智库
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
究员
- 侯春林** 河南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副
教授
- 王传顺** 井冈山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 赵春风** 重庆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 曲晓梅**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昌吉学院
外语系讲师
- 邹志强** 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副研究员
- 宛程** 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 黄晓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 张柏韡**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博
士研究生
- 唐梓翔**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
究生
- 楼天雄** 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
中心实习研究员
- 李金睿** 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学院质量管理工程专业
学生